



陕西耀县药王山，因唐代药王孙思邈隐居于此地而得名。药王山博物馆现存石刻、石碑及摩崖造像等，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计有北魏、西魏、北周、隋、唐诸朝佛教、道教、佛道混合造像百余通；佛、道教圆雕石造像及石塔五十余座；北周、宋、金、元、明、清、民国历代石碑一百三十余通；隋、唐、金、明摩崖造像四十三尊；金代古建一座；道教宫观壁画两幅；明、清建筑群两处和大量明、清石牌坊、石雕等。

佛教于东汉由印度传入中国后，到南北朝时期已经在民间普及开来，在中国北方地区雕刻佛像已蔚然成风。在当时的历史背景及地理环境下，人们常以家族或结邑组织方式集资，采用在中国产生已久的石碑形式、雕刻出供奉佛教的宗教石刻——造像碑。在关中地区道教信徒也采用了这种形式，雕刻了一批道教造像碑刻。建于北魏太和二十年（公元496年）的《姚伯多兄弟造像记》即为此处最著名的道教刻石。因南北朝时期，道教碑刻存世较少，此刻石就显得尤为珍贵。

《姚伯多兄弟造像记》亦称《姚伯多兄弟造文石像》。正书，二十三行，每行二十八、九字不等。石刻。碑阳、碑阴、碑侧均刻有造像和文字。自清代中期书家重新认识了汉魏六朝碑版的价值后，在书法界掀起了向民间书风学习的热潮，此风至今依然盛行，已形成与“二王”帖派书法相对应的碑派书法。此类书家崇尚粗头乱服式的荒率之美。正因如此，《姚伯多兄弟造像记》一经面世，就引来了书家的普遍关注。康南海评此类碑刻“拙厚中皆有异态”，评者说：“变化不可端倪，字形大小参差，笔画巧拙相生，极富自然活泼的异趣。”然而此异趣是如何产生的，我们却要有一番分析。一般说来，北魏造像分雅逸和粗犷两种不同的表现形式，雅逸者由书家书丹后由名刻工刻成，此类作品书者和刻工均为高手，故还原作者笔意较为充分。点画细腻、结字规整、章法完美。如北魏皇家墓志中的《元桢墓志》、《元怀墓志》等。另一类是未经书丹而直接由刻工信手刊刻，因而具有粗犷、草率、任意布置、面貌多变的特点，如《杨安族造像》、《惠荣造像》等。那么是否还有第三种情况，民间书手书就后，由普通刻工刻成，产生了另外一种审美形式。章法上相对均匀，结字上却生出许多荒率之意。



细读《姚伯多兄弟造像记》应为此类作品的代表。从用笔上看，《姚伯多兄弟造像记》书丹者以圆笔为主，保留着许多隶书笔意，如走之捺，心钩隶意明显。但由于刻工误刻，现在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更多的是方笔和以方笔为主的线条。刻工大概是先用切刀，然后直接冲出，收刀时不十分讲究，故而产生一种异状线。从结字上看，字形趋于扁方或不规则形状。横画主线伸长，倚侧之姿颇多，如：“穷”、“会”、“畅”等字。此类恣肆无度，形无常态的字形在该造像中大量出现。也正因这类字形的出现，给今天的书学者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。在一般人的眼中，汉字是方正的，点画，结字应以唐楷为标准。自清中叶以来，书家已不满足规规矩矩写字这一书写模式，他们把眼光投向汉、魏、六朝，在那里发现了一个更加美妙的世界。“原来字还可以这样写”。从章法上看该造像基本上横成行，竖成列，但由于字形大小的差异，并未使观者有“状若算子”之感，更由于它是民间造像，逸笔草草，增添了它的野逸之气，此石刻距今已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、风化等自然因素更产生了浑厚、朴茂之感。平添了几许苍茫、神秘。

综上所述《姚伯多兄弟造像记》虽为民间书手、刻工完成，不是十分精细。但其字态多拙趣，含妙理，天真浪漫，用笔浑厚、苍劲、以方带圆，魏隶相融，通篇体势宽博流畅，气满神足，拙朴苍浑。这是书丹者书法的拙朴和刻工粗狂的刀法“合二为一”的妙作。对于当代已具有相当创作能力且需要打破自己的固有的思维，提炼出自己个人风格的书家无疑是一剂良药，如果提炼得好，在此类碑版的基础上形成自我的创造风格就不远了。

经典重读

